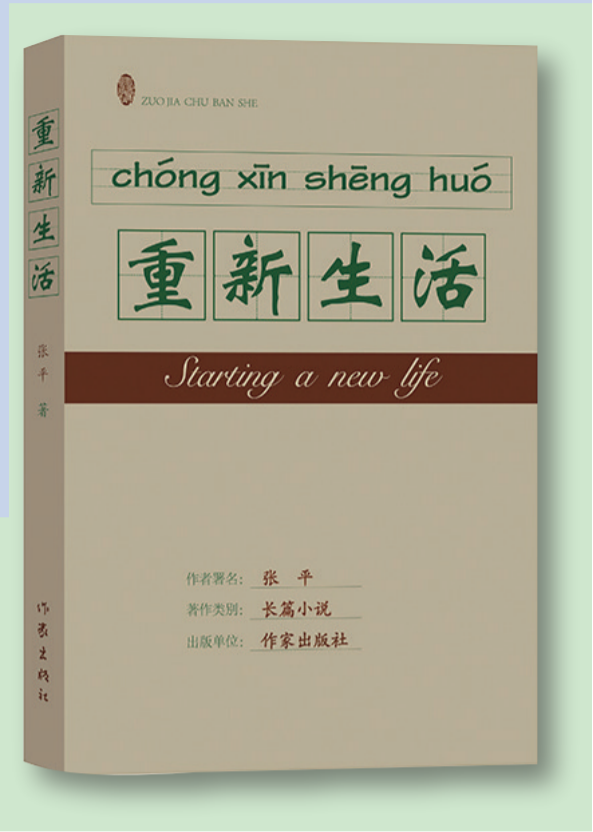


警世之作

——读张平长篇小说新作《重生生活》

□仲呈祥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的一种,韩作荣先生的这本《天生我材:李白传》却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1. 韩作荣先生于2013年11月12日凌晨辞世,于不幸和悲恸中万幸的是一本30余万字的“李白传”书稿刚刚在去世前改定、完成。韩作荣先生从2012年3月开始用了8个月的时间搜集、整理和研读资料,2012年10月13日开始动笔,一直到2013年10月7日陆续草成。2013年11月3日改毕,9天后离世……

《人民文学》2014年第3期选发了《李白传》遗稿中的部分章节,卷首尤其强调“本刊以‘特稿’发出韩作荣的《李白传》,不仅出于对前辈的敬重与怀念,更重要的是,这部传记本事扎实,言外滋味丰盛,值得收藏,适合精读细想”。

这是一部遗著,也是一份手稿,由韩作荣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在稿纸上。这种手写体的劳作方式在这个电子化写作和临屏阅读的时代几乎绝迹。尤其写作《李白传》更是一个耗日持久的巨大工程,关于李白的研究资料已经难以尽数,而这些资料的搜集、抄录以及书稿的伏案撰写,已经对一个人的体力、精力、耐力都是巨大的考验了。韩作荣先生的辞世也与其几年来为写作这本李白传记所累积的压力和超负荷身体运转有关。

一个诗人辞世,一本诗人传记得以诞生。为李白做传绝非易事,而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因为李白不只是被“经典化”“神化”甚至已经“神仙化”了,但这又是特别值得予以尝试的诗学工程。

一个伟大的诗人需要的是伟大的“读者”。尤其是从“诗人”身份写作李白传记的角度来看,韩作荣这本《李白传》在同类文本中具有补白的性质,结构完备,面貌突出而精彩纷呈。众所周知,韩作荣是当代著名诗人,由诗人为诗人作传更具有敏感、会意的精神共通性以及灵魂的天然亲切感以及自治性,也就易于打通时空距离的隔阂,从而为深入面对另一个诗人的精神世界、诗歌世界以及社会文化提供了诸多便利、可能性以及效力,“一个写诗的人或许更能理解诗人的心念、性格,更易为其豪气及其一生的悲剧所感染,体味其天生的神来之笔的可遇而不可求”。

2. 之所以说为李白作传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除了要通读、理解、消化、比较、整合、考辨几乎所有关于李白的诗歌、资料以及相关研究成果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至为关键的是这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历来就缺乏“传记”的传统,比如李白只是在《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唐才子传》《唐才子传校笺》中被极为简略地提及且相互之间诸多矛盾和穿凿附会之处,至于后来的笔记小说就更不足为信了。往往一个诗人“传记”资料本身是缺失的,而更多是通过诗歌承担了记忆和记录的功能,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有诗为证”。然而就唐诗而言,在其近300年的历史中所形成的诗歌传统、诗人形象以及抒写方式上恰恰普遍呈现出“传”和“本事”的整体缺失状况。更为普遍的情况则是所涉及到的诸多诗人的生平、情感、遭际以及流徙等等多为碎片化的,其间有很多的空白和盲点,甚至具体到一首诗的系年和真伪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比较极端的情况是龚自珍认为现存的李白诗歌只有120多首是“真品”。

为一个“诗人”立传,“诗”和“人”是不可二分的。质言之,除了要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的特质、风格有着极其深入的全面了解之外,还要对生平家世、品性癖好、交游、远游、政治经历、人生轨迹等等进行谱系学和年表意义上的“本事”予以完

以《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反腐题材长篇小说享誉文坛的山西作家张平,在搁笔10年后,如今又在新的高度上重执如椽大笔,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新作《重生生活》。他满怀信心地在《后记》中写道:这“仍然是现实题材,仍然是近距离地描写现实,仍然是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题材”,并颇含深意地称“也许,这才是我的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我以为,这可能正是作家给我们解读这部厚积薄发、深思熟虑而又不写不快、一发而不可止的新作的一把钥匙。

显然,这里铿锵有力的三个“仍然”,强调表明的是作家长期坚守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现实,反映时代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创作道路,强调重申的是他一以贯之的为人民、为时代鼓与呼的信仰、情怀、担当。而在创作了那么几部连续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反腐长篇小说并均已改编搬上荧屏获得成功之后的他,究竟为什么还要认为“也许,这才是我的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呢?

这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何谓“真正的反腐作品”?一气读罢《重生生活》,思绪联翩,仔细琢磨这“真正”二字的深意,方明白新作较作家此前的反腐作品,确实一是有着更高更深的哲学的文化的视点,这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以历史哲学和文化自信的高度来审视把握和艺术表现这一题材;二是有了更广阔更新的叙事的抒怀的视角,这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既要像小鸟一样跳跃鸣叫”,不重在正面展示腐败官员如何腐败,而重在深入描写揭示腐败文化作为一种业已形成的社会现象,究竟是如何触目心惊地污染学校、企业、医院、家庭等社会的方方面面,究竟是如何猖狂可怕地侵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腐败官员又是如何惨无人道地给人民、给亲友带来痛苦和灾难。

张平的可贵,正在于他的新作不重复自己,自觉紧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努力追求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让自己创作思维的目光更深远、更广大,向着现实生活的丰富和复杂开掘,向着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处和奥秘探寻,讲好独特而富有深度的中国当代反腐故事,以警世骇俗,凝聚人心。

以“诗”入史 为“人”做传

——评韩作荣《天生我材:李白传》

□霍俊明

备的搜集、考证、勘察和寻踪,甚至要进行重新的发掘以及知识考古学的工作。

对于一个社会阅历丰富且广泛出游的诗人而言,韩作荣在此方面占有天然的优势,“李白一生所走过的地方,其祖籍故乡、长居短居之处,我几乎都去过,可他‘酒隐安陆,蹉跎一题材’,是有了更广阔更新的叙事的抒怀的视角,却从未涉足。或许是欲写这部《李白传》的缘故,读太白诗中言及的行踪,一入眼帘我便想起那里的山川风物、民风习俗、人情冷暖、人文地理,写起来感到心里有底,似有一种在感无形托着,心手不虚。可从未领略其风貌之处,看资料时也感到云里雾里一般,不敢下笔。”

尽管时过境迁甚至沧海桑田,但是有时候实地考察往往能获得更为真切的历史现场感,而感同身受是最具温度和可信度的对话方式,“晚居于白兆山宾馆。因这个季节已无游人,空山更空,山居清冷,阴凉之气逼人。接待者看我是一位老同志,特给我安排了一个大房间。可空调小,房间大,虽整夜开着暖气,房间仍无暖意,冷风从窗缝钻进来,盖了两床被子仍冷得哆嗦。这时节我想起李白在这山间一住多年,这冰冷的冬日该也难耐”。甚至于当年的废墟、遗迹以及行踪的山川水流间能听到当年诗人的呼吸。对于当年李白的行迹,韩作荣做了非常详细的考证甚至实地考察,比如早年李白在蜀地壮游的时候韩作荣就从具体的空间、路线和坐标予以了极其精确的还原,比如李白去江油关“必走通峡,甘的艰险蜀道阴平道。此小道为三国时邓艾伐蜀时于无人烟处开辟的山势凶险、布满荆棘的小路,其时邓艾率兵将行荒无人烟地七百里,于险恶处‘滚毡坠石’而下,奔袭至古江油关。”

3. 尽管对于唐代诗人而言“诗歌”具有传记功能和文学史因素,但是由于李白的“诗”与“史”之间往往呈现了虚化和模糊的陈述关系以及李白形象大体是通过诗歌中的“角色扮演”和特定的话语角色而强化和塑造出来的,同时也出于对唐诗传统的深入理解,最终韩作荣不得不选取了“以诗入史”的方式。即沿着李白诗歌的生成脉络来索解、追踪和叙写李白的生平,而这最为合宜而准确的方式,“李白飘逸的行踪、起居故事、所思所想、平生经历等,史书鲜有记载,然而诗人所历之处,多有品题,虽动乱之时,其作品十丧其九,但其所留干来首诗书赋文字,仍如日记一般,透露出一个鲜活可感、有血有肉、才华横溢、盛气凌人、个性鲜明的李白来。”

“以诗人史”,就必须对“诗”有着独特而精准的把握和理解,继而再考察“诗”与“人”“时”“事”“史”的互文关系,尽管这一关系具体到唐诗传统以及李白写作显得空前复杂而含混。单从李白诗歌的题材来看就相当广泛、多样,比如寻仙问道、山川风物、离愁别绪、边塞远征、民间疾苦、社会万象、怀古幽思等等,显然,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和“道教诗人”“隐逸诗人”的简单化标签所能涵括得了的。

长久以来在阅读效果史中李白成为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豪放诗人”“乐观诗人”,但这显然是将李白诗歌文本的风格直接对应于诗人人格的刻板做法,而作为个体的人以及诗人的复杂性显然由此受到了遮蔽。韩作荣对宽泛意义上

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刻板印象持审慎和疑问的态度,“对李白最常见、似乎已成为常识的说法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对于李白式的“浪漫”韩作荣将其中一个原因归结为“魏晋情结”,而李白对“魏晋风度”的追附就自然离不开酒,离不开他一贯的宿醉以及觥筹、豪饮和狂饮,“我相信李白喜欢酒该是受家族源自西域粗豪之风的影响,也与蜀人‘俗尚嬉游,家多宴乐’之及时行乐的风气有关”,“或许,李白喜欢酒,更多的缘由是他深受魏晋情结,即纵酒携妓的名士风流的影响有关”。而只有真正地通读和深入理解李白的诗文,才能真正去除那些“惯见”的迷雾和刻板印象制造的“诗人面具”,还原出一个诗人的生命本相和诗歌的真正质素所在。比如针对着一般读者对李白的“豪放”“旷达”“狂放”的浅层印象和误解,韩作荣予以了有力的提请与拨正:“读李白全集,读得越多,越发现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由于李白思想观念的多元性,便注定了他心态的复杂;由于他理想、抱负颇为高远,其破灭失落时刻则摔得越疼、越惨痛;他的一生郁郁不得志,当一个过于张扬膨胀的自我处处碰壁,如气球胀破而粉碎,只能成为人生的悲剧。在这种情境之下,失意、愁苦、惆怅、哀怨、悲怆则如影随形,伴随了他的一生”。

4. 李白的诗歌充分展现了一个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和精神意志以及天马行空、电光石火般的怪诞驰骋的想象力。这是一个近乎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诗人,相关学者统计过李白诗歌中极高密度的700多次的第一人称“我”“吾”“余”,“李白关注的焦点始终有‘我’,一生立身行事出发点总在‘自我’,其观察和叙述的角度都在‘我’这个支点上”。对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志向的言说,遭遇的感受,抑或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思,甚至写神仙幻境,亦是‘我’的独特感受,是理想的外化,是主观感受的真实,情感逻辑的真实。”

这一诗歌中的“自我”显然既是性格、人性以及精神和世界观层面的,也是与现实、时代、历史甚至政治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必须对文本化的“自我”予以客观和准确的认知,“他是一个以高度自我为中心的诗人,主观色彩异常浓厚。诗作为一种主观的创造自然不能没有自我,即使展示一个时代也是诗人自我表达的主观感受,诗人以自我的体验和洞悟折射时代精神,体现诗人对人生、自然、社会的认知、判断和理解,继而形成一种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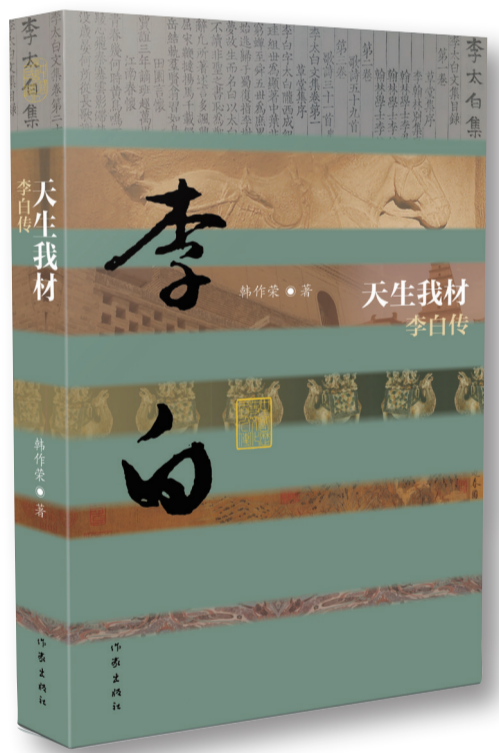
李白正是通过流传下来的不到1100首诗歌塑造了率真、狂放、怪诞、豪侠、放任不羁的疯狂行为和独特鲜明的个性,也由此塑造出了游侠、求仙问道者、狂饮者、采仙者、狎妓者、笑傲权贵者、“诗仙”、“谪仙人”的天才诗人形象。然而,诗中的“李白”显然是修辞化的,其与现实中的“李白”显然是具有差异的,“包括杜甫在内的其他唐代诗人,没有人像李白这样竭尽全力地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李白”恰恰是通过“诗歌”中的人物、意象、场景、情绪以及背景空间来完成的,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诗歌的时间、事件背景却缺乏必要的交

先说新视点。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反腐是民心所向。通常写反腐小说,视点往往注目腐败案件,注重展示腐败的形成和侦破腐败案的过程,亦即腐败与反腐败的矛盾斗争。这样写,易于环环相扣,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这对于揭露腐败形成的丑恶面目和表现反腐斗争的艰巨,当然是有意义的。《重生生活》不再重复这种着意于事件和案件的过程的视点,而更侧重于从哲学上文化上去揭示腐败人对社会的危害。张平在《后记》中说:作品“通篇都是腐败对人和社会的戕害和毁伤”。从哲学上讲,腐败是对人的善良人性的异化;从文化上讲,腐败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的消蚀和破坏。因为“腐败侵蚀的是人心,侵蚀的是人的道德、思想和人的行为准则,侵蚀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髓”,“当贪腐成为一种文化存在时,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沉疴和桎梏,要清除它,须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更持久的岁月,更惨痛的努力。”正是从这种哲学的文化的深邃高远的视点出发,小说30章的主要篇幅,主要在着力形象地展示“腐败的因子已经深入到我们文化的骨髓之中了”——请看,小说引子开篇,正在主持市委常委会的市委书记魏宏刚突然被省纪委带走审查,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影响到含辛茹苦把他一手带大的如母的长姐魏宏枝、姐夫武祥及正在准备高考的绵绵的人生命运,接着由绵绵的被逼转学牵出重点名校延门中学的校长、教务处副主任、班主任、押题高手等和郟县武家寨中学的教职员工等,再进而由魏宏刚的骄子丁丁被打致伤牵出医院、房产商建房工地、城市治理方方面面的各色人等,并以娴熟的艺术笔法剖析了魏宏刚代表的腐败一旦形成气候,作为一种文化势必侵蚀到反腐倡廉、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城市治理等牵动亿万民心的热门社会变革实践方方面面时,对人的道德、信仰、思想、节操的严重污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颠覆和破坏,对良好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对民心的涣散解构。张平说自己“思路是通畅的,人物是现成的,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顺着就下来了,一如是河污水,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正由于作家以人中心,以文化为灵魂,站位高,视点准,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丰厚扎实,人生感悟和哲学思考深刻独到,因此读者读起来激

情荡漾,欲罢不能。是的,“当贪腐理念沉淀于文化之中时,反腐就是一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殊死斗争,必然也是一场灵与肉、信仰与欲望之间的存亡较量”。

重拳反腐,功德无量,重振纲纪,国之幸甚。《重生生活》这样的高深度、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反腐文艺作品,可以有效地培养营造起全社会全民性的反腐文化氛围,仇视贪腐、鄙视贪腐,让贪腐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要靠“法治”令贪腐者胆战心惊,不敢贪腐;我们要靠“法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想贪腐者受到制约,不能贪腐;我们也要靠《重生生活》这样的文艺作品,提供思想启示和精神力量,让全社会和全民铸成无坚不摧的反腐文化,去顺应民意,凝聚民心,鄙视并唾弃贪腐!这正是《重生生活》这部现实题材反腐力作的新意和价值。

再说新视角。如果说,新视点保证《重生生活》把握了审视处理反腐题材的哲学的文化的制高点,从而保证了作品题材新颖、意蕴深刻;而新视角则主要体现在作家叙事和抒怀的重点,较之此前的同类题材反腐小说,视角发生了明显转移。《重生生活》作为作家自认为“才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其主人公既非腐败的市委书记魏宏刚,也非反腐第一线的纪委干部,而是受到魏宏刚贪污案牵连改变人生命运、受到戕害和毁伤的其姐夫武祥、姐姐魏宏枝和外甥女绵绵;其主要情节和场景,既非魏宏刚腐败案的形成和破案、审案的过程,也非市委领导机关和纪委、法庭,而是受到魏宏刚贪腐案牵连的学校、社区、工地、医院、家庭里发生的绵绵被逼转学、丁丁被打求医、魏宏枝受到审查、武祥贯穿全篇……应当说,小说笔墨最浓、塑造最活的,当数看似并不处于腐败与反腐败矛盾漩涡中心中的武祥形象。他的精神世界、心灵轨迹、文化内涵展示得最淋漓尽致、最启人心智,因而最具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而绵绵形象塑造所折射出的贪腐对教育战线和教育改革的侵蚀,丁丁形象所揭示的贪腐对医疗战线和医疗改革的污染,魏宏枝事有因受到审查引出的案情错乱和人性复杂……都是多么惊心动魄,惊世骇俗!小说之所以用了主人公武祥反复向亲人们嘱咐的一句话“我们要重新生活”中的“重新生活”作为书名,我想,其深意正在于此。



太白,却是永远长不大的人,他的心理年龄仍旧年轻,并葆有天真,仍活在梦境之中。说其是哲人和孩子的混合体,于独有的孤傲自负的性格中仍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为了还原李白的“人”以及“人性”,韩作荣甚至会在行文中偶来极具诗人特质的“闲散笔调”,有时从生活现场和日常饮食来理解当年的李白,“我惊异于扬州菜的清淡但多味。不知道初次到扬州的李白吃没吃过扬州炒饭,用芦管吸吮的包满鲜美汤汁的大包子,那细嫩的干丝,以及将素白的水豆腐切得如发丝一般精细的羹汤,和经长时间于罐内文火煨烤却极入味烂熟的猪脸之类,这些极好的蔬菜,该是大白的下酒之物。而这些食物的制作大都颇费工夫,所谓慢工出细活,没有耐心,没有闲情逸致以及安逸享受的时间和心志,以及熟能生巧的技艺制作和享用皆不可能。”显然,这样的“闲笔”和“散淡”化的叙述方式的穿插就避开了一般传记因为过于谨严、周密、逻辑和大量引用原文而带来的阅读的紧张感和疲惫感,而是带来了缝隙和孔洞。

6. 《李白传》是一部诗性、思想性和学术性兼备的著作。我们对一部传记作品还有一个要求,这就是“真”“真实感”以及“求真意志”。尽管任何传记都带有修辞化以及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形成的“传说”“传奇”“故事”“民间野史”就具有了合理性。传记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史传中的史实,而是语言化和精神化的“现实”。质言之,传记视界中的历史既是修辞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即使传主是同一个人,但是传记的结构方式和叙述角度却因人而异。

传记的“历史功能”是以“真”为前提的,这就要求传记或传记家具备个体主体性、求真精神能力以及重新组合历史的能力。而韩作荣的《李白传》不仅阅读、比较和整合了大量的关于李白的“自述”、同时代人的“旁证”以及后世的相关研究材料,而且还要对这些材料的真伪和矛盾之处进行审慎甄别,“我搜集那些论证有据、言之成理的可靠的史料,辨析众说纷纭的家族史、出生地、故乡、生卒年月等莫衷一是的言说,从诗文中查其行踪、心理,从其自述中洞悉生平籍贯、生存状态与气概、心灵。尊重有共识的看法,去伪存真,力争探究出一个真实可信、还其本来面目的李白来。”

与此同时,韩作荣在最大化的可能性空间通过诗、人、事、史这四者立体化的对话实践还原出了一个尽可能真实而复杂的李白。韩作荣不断强化了对李白的重新解读和理解,剥除了那些惯见和面具,通过诗人的“当代眼光”“人性视角”与李白和唐诗以及传统进行深入的对话、磋商与沟通。

任何一个诗人和作家都有深深的对抗时间的焦虑,他们也总是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穿越自己的时代而抵达未来的读者。而这样的诗人具有总体性以及精神共时体的特征,他们用诗歌对抗或化解现实境遇中的焦虑、茫然以及死亡的恐惧,从而借助文字世界得以永生。李白确切无疑地属于这样的“终极诗人”,而从“理想读者”的角度来看韩作荣先生的这本《天生我材:李白传》也具有面向“未来读者”的素质和可能性。